

引 言

一 选题原因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个热点。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关系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都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大致看来，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它们或者流于历史脉络的梳理，或者是就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讨，真正从日本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并不多见。这种状况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对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缺乏系统性；二是对中日关系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缺乏—种能够给予全局性把握的视角。为改变这种状况，本书试图对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并从这一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作—探讨。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变化的新趋向

本书虽然最终着眼点是探讨中日关系，但其出发点却是日本国内政治特别是日本国家战略变迁。之所以进行这种限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作为国际政治表现形式之一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不可能不受—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其国家战略定位的影响和制约。无数经验和理

论研究说明，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截然区分开来是不适当的。例如罗森伯格就认为，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界定为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而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开来是错误的。^①在冷战结束并已进入 21 世纪的亚太地区，日本是一个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需要扮演、可以扮演，而且应该扮演的国家。对它的国家战略定位进行探讨，对于深入了解日本人的思想意识，掌握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各种行为的动机，分析其进一步的动向并提出我们的应对方略，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一般常识来说，出于各种考虑，当一个国家试图摆脱一种国家形象而向另外一种国家形象过渡时，作为指导这一进程的国家战略是不会完全公开化的。这意味着我们对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走势的分析，应从日本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实际作为和日本政界人士的言论乃至其国民意识、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变化上进行综合分析。

从各种迹象来看，现在日本已经把废弃“和平宪法”，成为“普通国家”确定为基本的国家战略，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发展进程，就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过程。1992 年 6 月，日本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两个事件：一是国会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简称“PKO 法”）；二是宫泽内阁制定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简称“ODA”大纲）。前者使日本在战后一直努力尝试的军事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日本在联合国名义下向海外派兵打开了大门；后者标志着日本的对外援助方针从经济中心转变为政治中心，为日本运用对外援助增强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提供了依据。这两项举措是冷战结束

^① [英] 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7 页。

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初步成果，标志着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初步实施。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解体之后，成为“普通国家”开始正式纳入日本政治的议事日程。“从细川内阁成立后的政治家的议论来看，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包括更大军事作用在内的‘普通国家’路线赞成与否可能成为新的政党间斗争的焦点。”^①其实不仅仅是政党改组，冷战结束后历届日本内阁的施政方针都带有浓厚的“普通国家”印记。对此，阿部齐指出，为了改造日本而提出的具体提案，如推举强有力的领导人、修改宪法、地方分权等等，实质上就是要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改革。^②1998年7月，小渊惠三当选日本首相以后，通过“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等一系列立法措施和国内改革，扫清了长久以来阻碍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许多禁区，日本在迈向“普通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切实的进展。从新世纪开始后日本政局的演变趋势看，在冷战结束后关于日本国家未来走向问题的路线分歧中，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的“民生大国”论市场渐失，而以对外自由、自助、自决为特征的“普通国家”论取得了主导地位。对此，我国有学者指出，随着2003年5、6月间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关于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争论已经结束，“普通国家”论战胜了“民生大国”论，走“普通国家”之路已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共识，并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安全战略调整规定了根本方向。^③正如小泽一郎

[日]新藤宗幸、山口二郎主编：《现代日本的政治与政策》，日本财团法人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5年，第41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③ 姚文礼：《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6期。

所言，自从 1993 年提出了他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想法后，“日本的意思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逻辑上讲，我的主张正在被大多数人所认可”^①。可以预见的是，近期内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进程都已不大可能停止，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快。

（二）“普通国家化”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与欧洲、北美等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具有更大的可变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日这两个亚太大国都处于重要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日本已将彻底摆脱战败国地位、成为“普通国家”作为其国家战略取向所带来的冲击。国家战略是确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普通国家化”战略，必然对日本的对外政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其实，“普通国家论”是对中曾根提出的政治大国论的继承和发展。“普通国家”成为日本政界人士普遍认可的通用语，说明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已经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发言权，并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自主的一极，是“普通国家论”的基本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和措施，除了在国内向国民灌输大国主义意识，力图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外，在外交上主要还包括以下几方面：（1）大力发展经济外交的政治功能，突出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使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2）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最大的国际发言权，特别是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3）加强对亚、非、拉的外交，谋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中心作用，扩大在拉美和非洲的影响；（4）调整防卫战略，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在

[日]小泽一郎：《我的新改造日本计划》，载日本《论争》2001年第2期。

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军事作用。日本政府的上述举措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已不再满足于冷战期间所要求的一般的、具体的、局部的权力和利益，而开始把战略目标扩展至更为广泛的国际舞台上，追求左右和控制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制的最高权力。近年来，这些主张已经在政、官、学、传媒等各界得到了广泛支持，明显地在日本内政与外交政策调整进程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可以说，在“普通国家化”的总体框架下，日本确立了以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政治影响为基本目标的对外战略。如果说90年代初期日本一些精英主张的“日美欧三极论”反映了一条“脱美自主”的外交路线的话，那么取而代之的“美国霸权稳定论”和“日美主导东亚论”，则意味着日本选择了一条以“亲美自主”为特征的、实现“普通国家”目标的外交路线。1994年以后，以日美同盟“再定义”为契机，日本调整了构筑“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大国路线，改而采取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在东亚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①。2000年1月小渊首相的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的最终报告把“日美同盟”和“日美欧三极主义”并列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支柱，说明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始终是日本政界不变的目标。目前日本国内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各种理论，与其说是21世纪的长期战略，不如说是在没有替代方案下的中短期战略和长期策略^②。不管形式如何改变，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就是追求“普通国家”地位，利用自己的经济大国地位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迈进，最终达到在世界上拥有主导、支配地位。日

^① 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本外交战略的这种变化，既有合理的要求，又包含着某些危险倾向，必然直接涉及中日关系的调整。对中国来说，准确把握这种演变趋势，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重大的对策研究问题，而这离不开对日本国家战略的准确定位。

（三）中日关系发展现状提出的新课题

冷战结束后，不仅日本进入了经济、政治、外交、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期，中国的内外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两者相互作用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现代化建设路线，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支持政策，两国的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及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走上了全面、健康发展的轨道，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上的“蜜月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极格局的终结促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形成了一股国际关系重新定位的历史潮流，中日两国关系也进入了一个转折期，面临着重新调整与定位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领土与海洋资源问题、经济合作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均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日本在调整防卫政策的过程中，千方百计把普通国民对中国的情感导向对中国的恐惧和警戒，试图在新的对华战略中注入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成分，自卫队部署针对中国的一面不断突出。90年代中期新的情报本部成立后更是把中国作为情报搜集的主要对象，日本在处理海洋权益争端时的态度日趋强硬，也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对这些在“中日友好高于一切”的外交原则下被掩盖起来的各种问题的激化，我们往往倾向于从“日本威胁论”或者“中国威胁论”的角度进行说明。这显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两国关系的现实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则有失片面。“中国威胁论”也好，“日本威胁论”也罢，其

实质都是对彼此国家战略定位的一种反应，主要是国内政治问题。日本学者田中明彦认为，决定双边关系的并不仅仅是国际环境，1995年前后日中关系趋于紧张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他特别指出，再次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的背景中无疑存在着对中国将来会成为何种国家的关注。^①日本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待其对外战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的，中国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化也只有从这一层面进行观察才能找到分析问题的正确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促使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②中国如何估计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化趋势，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趋势，所有这些需要双方予以解答的重大课题，实质上都是对对方的评价问题，并且最终都要归结到对国家战略的重新认识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定位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对彼此国家战略特征和发展趋向的认识是否正确。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发展受日本国家战略转变影响的痕迹非常清晰。不过已有的研究多把重点放在日本军事大国化上。应该说，成为军事大国是“普通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和特征，但这并不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全部内涵。“普通国家”的另一个支柱是“国际经济”方面，日本正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外交来为“普通国家”开路的。从更深层次的意义讲，“自主性”、“平等化”和“大国化”是日本“普通国家论”的实质，而

^① 「日」田中明彦：《日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为中心》，蒋立峰主编：《中日青年论坛：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② 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第254页。

在这方面，我们的认识显然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这样就难以对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各种举措有一全面的衡量，也不利于我们正确处理中日关系。90年代中后期，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分析思路逐渐发生转换。但如果脱离了对“普通国家”实质的认识，无论是文化分析也好，对日新思维也罢，都难以起到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发展趋向的判断往往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有人说，日本只有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才能成为世界大国；只要日本坚持日美同盟，日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而强调日本民族的“自主性”正是“普通国家论”的核心，上述观点说明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清楚。这也是我们把对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关注点过于集中到防卫战略转变上的主要原因。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世界第二军费大国日本的防卫走向必然会引起亚洲乃至世界的关注，而且关于日本防卫政策的研究是一个涉及战后日本国家性质变化亦即日本向怎样的“普通国家”转型的课题，因此对日本防卫力量的全面了解是正确认识日本不可或缺的条件。^①但是这不应该是问题的全部。1994年10月，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日本综合战略大纲》强调，日本要塑造新的国家和社会形象，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这说明“普通国家化”并不仅仅是军事大国化，我们的分析就是要改变人们上述认识中的这种缺陷。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一会儿要求日本独立于美国，一会儿又希望日美同盟能够起到控制日本军事大国化作用的功能这样一种两难境地。

^① 王少普、吴寄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二 “普通国家”的内涵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发展的脉络及人们的研究倾向看，将“普通国家”等同于“军事国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例如，日本前副首相后藤田指出，海湾战争后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利用军事力量为国际社会做贡献。^① 2002年3月，日美两国专家在东京财团的支持下举行的题为“全球恐怖时代与日本防御——旨在建立日美新体制”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志方俊之指出，所谓“普通国家”是指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了同盟的共同目的使用现在位居世界第二的常规武器。即使是对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怀有疑问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也是从军备的角度分析“普通国家”这一概念的。在他看来，普通国家有三类：一是像英国那样的小美国，拥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舰等军事力量的国家；二是像拥有核武器的中等国家法国或成为没有核武器的中等国家德国那样的国家；三是如挪威和丹麦那样的轻武装国家。^② 中国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多数也持有上述观点。尽管这种分析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只是揭示了日本“普通国家化”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普通国家”的概念内涵作一全面的分析与界定。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普通国家”作用的两个领域

“普通国家”作为阐述日本国家战略理念的命题，其内涵不仅仅是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中做出军事上的贡献这一解释所能涵盖

^① 日本《朝日新闻》1997年5月3日。

^② [日]哥川令三：《全球恐怖时代与日美新体制》，载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4月9日。

的。小泽一郎在阐述“普通国家”的构成要件时，既强调了日本要在安全保障即国际政治方面做贡献，又对进行国际经济合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只不过由于人们过于注重这一命题与过去日本国家战略理念的区别而导致了大多数人对后者的忽视。日本学者土屋健治曾言，由于日本有过侵略的历史，冷战时期日本只能在经济方面做贡献，海湾战争后，日本则必须回答如何在其他方面做出贡献的问题，即要做一种“综合贡献”^①。因此在分析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时，我们应该坚持进行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并把“普通国家”视为一个过程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内政与外交实践。

参与国际事务的水平是增强国家形象积极效应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理论所强调的不同于以往的内容也不是以赤裸裸的日本要做军事大国的面目出现的，对日本在日美同盟、自卫队、日本国宪法等方面的新举措，其着眼点都是所谓“和平创造”或“创造和平”，即坚持一种安全内涵扩大的观点：日本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安全，也必须把国际安全纳入国家行为视野。正如梅原猛所言，日本的国内安全可以向世界夸耀，不过，从国内向外迈出一步，考虑到更大的安全——全球规模的安全时，日本应该考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 21 世纪的世界命运做出贡献。^② 1991 年和 1992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都写进了“为国际做贡献”的内容，表明了日本要通过军事介入国际事务的决

周季华：《日本学者谈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对外关系》载《日本问题资料》1992 年第 7 期

^② [日]梅原猛《森林文化——日本文化的原点》卞立强 李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61 页。

心。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自己过去的经济外交优势。日本 1991 年版《外交蓝皮书》认为，海湾危机促使日本外交发生了变化，日本应在宪法的范围内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样一种呼声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不过在说明日本外交的努力方向时，白皮书同时认为，日本要在“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为维护民主等所作出的努力”、“超越国界，重视全人类面临的课题”、“维持和加强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对向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转移提供援助等方面发挥领导性的作用”等方面展开工作。因此“普通国家”并不是对日本原来国家战略的全面否定，只是内涵有了扩充。以经济合作的形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依然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一。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观念作为对上述政治发展趋向的理论总结，最终所揭示的乃是一种不仅要继续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形象。就如中国一些学者所说，所谓“普通国家”，其内涵一是指日本应该面向开放的世界，拥有大国的国际权利；二是指日本应该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禁忌”，拥有向海外派兵的权力。^①

当然，这种新的国际贡献论与过去相比还是有所区别的，那就是注重从“物的贡献”向“人的贡献”转变，对非经济的各种问题——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日本都要寻求金钱以外的解决方式。在海湾危机处于高潮时，小泽一郎就表示，宪法禁止的集体自卫权和联合国部队的集体安全保障完全是两回事，自卫队参加联合国部队并不违反宪法；以小泽为会长的“自民党关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调查会”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个问题出现后，又提出了“国际安全保障”的新概念。在系统阐述其政治观念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小泽一

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93 页。

郎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国家形象是由一国的整体行为体现出来的，而有些行为的世界意义则表示了国家形象的某种水平。由于过去日本在“人的贡献”方面的表现要落后于“物的贡献”很多，因此当日本开始谋求在国际安全上的作为时，我们自然对此有了特别的关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普通国家”作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普通国家”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国际上正常发挥军事作用的国家，就是要“告别战后”，修改宪法第九条，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禁忌”，让日本拥有军队和向海外派兵的权力等等。换言之，“普通国家”就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代名词。^①而广义的“普通国家”则以日本的国际化为主线，强调日本不仅要在国际社会里做出军事贡献，还必须承担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责任；不仅包括对外战略的制定，也包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造，可以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和综合的范畴。当然，这种广义的解释并不是要否定狭义解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虽然受国家观制约的国家形象是由这个共同体的整体行为塑造出来的，但由于在这些整体行为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所谓“中心与外围”关系，所以人们往往因在某一历史阶段某种行为成为国家活动的中心而造成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正如我国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往往可以对某件事、某个行动产生强烈的印象，却很难全面、整体地把握由这些事情和行动所体现的国家形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事情和行动都有轻重缓急，在时间先后，结构形式，功能作用，影响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使人难以

^① 张雅丽：《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8 页。

对其中的联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所谓中心与外围，就是这种复杂联系的一个方面，即是说，在一个国家内、甚至在数个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中心’的活动上，也可能只看到‘外围’的活动就把它当成国家形象的全部了”^①。因此对“普通国家”进行广义上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二）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普通国家”的深层内核

如前所述，认为“普通国家”就是以“为国际安全做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重新获得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力”，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也是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主流观点。为了说明问题的简约，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但如果把“普通国家”视为国家战略选择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则有失偏颇。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并存与交织的当代世界中，“普通国家”虽然是以为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做贡献表现出来的，但其深层底蕴却是对“自主性”、“平等化”、“大国化”的全面追求。小泽一郎 1992 年就曾指出，日本是依靠美国、西欧等国家创造的和平、自由的环境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冷战时代的日本。现在冷战结束了，“世界对日本提出了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够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②。在这里，谋求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等地位，增强政策的自主性，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因此所谓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虽然其表象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大国化，

^① 孙津：《赢得国家形象》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

^② [日]小泽一郎：《我们为什么主张改革》，载日本《文艺春秋》 1992 年 12 月号。

但其实质却是日本国家决策上的“自主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系上的“平等性”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化”三种趋势的结合。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认识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才能弄清楚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任何一届日本内阁明确提出这一目标，我们却说日本在“普通国家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在国际政治层面，概念的提出往往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影响我们对问题实质的分析。

1. 自主性

冷战即将结束之际，日本学者猪口邦子提出了“后霸权体制”这个命题，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一种通过各个国家之间不断地协商与协作、协调与协约而得以维持的和平，是一种通过反复不断的微调而得以再生的秩序；他强调世界各国将在各种政策领域积极推进全球协作以确保自身的生存。不过，猪口邦子认为这种协调主要是一种自主协调，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拒绝自主协调，也许恰恰就会丧失自身的自主性。^①而作为探讨日本生存之路的大型综合报告《90 年代日本的课题》同样强调，未来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重要性逐渐加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也不能轻视国家的自立性、主体性”，“注意相互依存和自立性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②。日本驻欧共同体大使藤井宏昭指出，在 90 年代的多中心体制下，日本外交的基本着眼点是创造一个能使相互依存顺利扩大与深化的环境，但日本只有坚持独立意见才能发挥多中心体制中一翼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冷

^① [日]猪口邦子：《后霸权体制与日本的选择》，杨伯江译，时事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22 页。

^②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编：《90 年代日本的课题》，彭晋璋监译，纪廷许审校，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2 页。

战体制下，秩序对日本来说是既定的条件；而在多中心体制中，日本是秩序的创立者之一。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应不断提高作为独立国家的风格与坚韧性。^① 日本外务次官栗山尚一同样认为，要想成为国际大国，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形象。为此提出自己的主张，忠实于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价值原则而进行的外交是必要的。在冷战结束以及美苏两极体制崩溃的情况下，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基本课题就是如何确定自身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以及如何使其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作为发达民主国家的一个主要成员，日本迄今为止的那种被动外交必须结束。^②

归纳起来，上述看法的核心是，认为冷战结束正在使日本国际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国际事务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固然重要，但作为世界大国的日本只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国际社会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作出处理，才能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这种观点直接为小泽一郎所吸收。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小泽一郎提出，随着经济大国化的发展，日本已处于一举一动都能对世界各个角落产生影响的状态，不管愿意与否都不能免除作为大国的责任。为了履行这种责任，日本需要制定“主体的、综合的、长期的、灵活的、首尾相贯的政策”，然而日本现在却做不到这一点，“只能确定被动的、部分的、短期的政策。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政策，制定起来也非常勉强”^③。在他看来，日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个人自主基础上的国家自

① [日]藤井宏昭：《90年代的国际经济与日本的作用》，载日本《外交论坛》1991年第1期。

② 日本《每日新闻》1991年2月19日。

③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日本讲谈社1993年版，第17页。

主。^① 进入 21 世纪之后，小泽一郎再次指出，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之所以稳定，主要是政治因素和外在因素起着作用。正是由于冷战的存在，日本才有了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极好环境，并成功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支付支撑日本经济发展成本的情况不复存在了，日本要自己负担成本，自负盈亏，形势要求日本自立。^② 其实，正如日本有人指出的，不仅安全保障问题，就是连处理世界上的南北问题、环境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重大课题，也需要通过认真开展自主的、积极的外交来应付。^③ 这说明强调国家的自主性是“普通国家论”的实质所在。

2. 平等化（对等化）

作为对国家自主性追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冷战结束后日本特别注意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保持关系中的平等化（对等化），以此来保证“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可以说，平等化是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中外交政策和国际观重整中的核心理念之一。

国际观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根本认识，它通过民族国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来。从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实践来看，构成日本人国际观主要内容的，一个是如何看待世界和美国，一个是如何看待亚洲和中国。总体说来，日本人的国际观始终是在加强日美同盟与强调日本的独自性和同中国合作与防范中

①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日本讲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② [日]小泽一郎：《我的新改造日本计划》载日本《论争》2001 年第 2 期。

③ [日]福冈正行：《无海图的日本政治走向何方》，载日本《中央公论》1991 年 9 月号。

国这两个矛盾中摇摆。^① 由于日美基轴是冷战时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对平等化的追求首先是围绕对美关系展开的。其实，这一进程在日本重新成为经济大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演变中表现得很清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日美全球伙伴关系宣言》（1992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所代表的“集体防御”、“共同合作”、“全球伙伴”、“新军事同盟”等日美合作方式和内涵的转变，本身就说明日本逐渐取得了对美关系的平等化。

此外，日本还通过对联合国维和活动的积极参与，开辟了另外一条对美关系平等化的途径。冷战时期，由于国际格局的制约，日本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维和活动的机会，其对国际社会的自主贡献主要是通过经济外交这一途径来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日本利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遍要求日本在人员贡献上承担国际安全责任这一契机，试图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寻求对美关系的对等化。例如佐伯喜一就提出，在日本的GNP已达到美国60%以上的情况下，应该修正日美同盟的极端的非对称性，使之达到维持美日同盟关系所必需的程度。为此，日本应追加的最低限度的军事任务是建立起能够全面协助联合国旨在维持和平、创造和平的军事行动的态势。^② 实际上，日本政府正是这样做的。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PKO法”，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体制，打破了日美双边合作的常规，为日本实现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对等化找到了一个逐渐为

^① 崔世广等：《日本近期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

[日]佐伯喜一：《冷战以后亚洲的安全保障》载《日本问题资料》1993年第8期。